

影响我国省际流动人口失业主要因素的实证分析 ——基于2015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的验证

陈怡蓁 陆杰华

(北京大学 社会学系, 北京 100871)

[摘要] 流动人口一直是学界近年来关注的研究议题。随着流动人口规模不断扩大, 尤以省际流动人口的比例更是持续增长, 其中经济因素为省际流动人口的流动主因, 因此他们在流入地面临的失业问题不容忽视。基于2015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 本研究采用描述性分析及logistic回归分析来探讨省际流动人口受其个人特征、区域特征及流动特征等方面对其失业产生的影响机理。研究结果发现, 省际流动人口失业形态以结构性失业表现居多, 其成因与个人能力及区域发展背景密切相关, 为此提出缓解省际流动人口失业的相关建议。

[关键词] 省际流动人口; 失业; logistic回归分析

[中图分类号] C92-0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1613 (2018) 06-0010-10

1 研究背景

2017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指出, 全国人户分离人口为2.91亿人, 其中流动人口占达2.44亿人, 虽然自2015年起流动人口减少了约900万人, 呈现出小幅度的下降, 但与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 仍然增加了约2300万人, 长期呈现出上升的趋势(国家统计局, 2016), 因此流动人口规模正随着时间稳定增长。再从流动人口内部来看, 跨省流动的比例相比于其他短距离流动, 呈现上升的变化(段成荣等, 2013), 显示出长距离流动作为流动人口流动类型发展趋势的可能性。然而, 省际流动人口的地域分布并不均衡, 由西向东作为该群体的主要流向, 并以流入北京、天津、上海、广东等沿海省市为多数, 表现出由经济欠发达地区移至发达地区的鲜明特点, 并且从该群体流动原因的统计中, 发现经济因素是其迁移的主要因素(马红旗等, 2012), 以及进一步的研究更指出, 除了工资水平外, 流入地的市场规模、就业机会等因素也渐被流动人口纳入考虑范围(余运江等, 2018), 那么在流动后是否能顺利就业或得到更好的就业机会, 对流动人口来说就格外重要。

以往流动人口在进入流入地后, 其就业的选择性不高, 以从事廉价劳力工作居多(刘耀, 1996)。然而, 随着经济发展进程加速, 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后, 将降低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重并朝着高技术产业的方向发展(张侠等, 2006), 使得原本能吸纳低端劳动力的行业纷纷转型, 造成这些

[收稿日期] 2018-06-02

[作者简介] 陈怡蓁, 女,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 人口社会学; 陆杰华, 男,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博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 人口经济学。

劳动力被释放后无处可去而产生结构性失业 (成学贞等, 2005)。在这些失业人口中, 包括为数不少的流动人口。此外, 由于多数流动人口本身就业能力受限, 过度集中于技术含量较低且替代性较强的工作上, 造成该群体的就业环境恶化, 进而更容易产生失业的情形 (黄婵, 2012)。

此外, 2017 年召开的党的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强调了改善民生的重要性, 并提出民生的最大根本即为就业。然而, 如何使就业在未来能够持续增长, 除了主动拟定就业政策来扩大就业规模之外, 提升就业质量对于稳定就业并有效处理结构性就业矛盾更是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如今, 省际流动人口作为整体流动人口中比例持续增加的群体, 其失业问题对于整体流动人口, 甚至全国失业人口, 将产生重大影响, 更对于我国促进就业发展的进程上存在一定程度的抑制作用, 因此对其失业问题做出进一步的研究尤为重要。本文尝试筛选影响该群体失业的主要因素, 有利于缓解其失业的情形, 进一步为有效降低我国失业水平以及扶持就业做出贡献。

2 相关文献回顾与评述

以往与流动人口失业问题相关的文献中, 部分研究从宏观的经济、产业层面来分析流动人口的就业问题。沈琴琴、张艳华 (2010) 将北京市的产业结构与流动人口的就业结构进行比较, 发现流动人口的教育程度普遍较低, 就业能力受限, 与产业结构所需的人才存在不匹配的现象。许多研究也指出, 随着发达地区经济和产业结构的转型, 劳动力市场需求结构发生根本性变化, 大批农民工因劳动力素质较低, 无法满足劳动力市场需求而产生失业的情形 (李群等, 2014; 钟在明等, 2011; 成必成, 2013)。

另一部分的研究则是从流动人口的微观特征对其就业问题展开讨论。首先, 性别是影响流动人口就业的因素之一, 由于社会上对女性的就业歧视, 使得女性流动人口在就业上存在相对弱势的地位 (罗俊峰等, 2015; 王俊秋, 2009)。其次, 家庭化流动模式的类型对流动人口就业也会产生显著的性别差异, 但不同研究得出的结果不大一致。张丽琼等 (2017) 指出, 家庭化流动对流动男性的就业率无显著影响, 但对其就业的稳定性存在促进效果; 而完整式的家庭流动则对流动女性的就业产生了不利的影响。而另一些研究则指出, 无论男性或女性都会受到家庭流动带来不同程度的负面影响 (张航空等, 2012)。再次, 有些研究从民族的角度出发来探讨流动人口的就业问题, 由于语言、习俗、信仰、文化素质等个人问题以及外部的体制性问题, 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就业产生了制约 (刘璐璐, 2011; 文久富等, 2007)。另外, 还有一些研究是针对流动人口的就业特征进行分析, 慕松玲等 (2014)、王胜今等 (2013) 以吉林省流动人口为例, 指出该省流动人口主要的职业类型及结构特征受到了性别、年龄、教育程度、户口性质、婚姻状态、流入原因等因素的影响。

综观前述研究, 多数是以个案性质的讨论为主, 研究对象局限于区域性、小范围的特定流动人口, 这可能导致在处理流动人口的失业问题时欠缺一个统领性的指导方针。另一方面, 由于已存在大量从流动人口就业视角进行的研究, 由失业角度出发的研究则相对欠缺, 未能全面地对流动人口的失业特征进行详尽的分析。本研究基于有关流动人口失业问题的研究尚未完整的情况下, 侧重以当今人数逐渐增加的省际流动人口作为研究主体, 分析影响长距离流动人口失业的主要因素, 并做出一些政策性的讨论。

3 研究设计

3.1 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源为国家卫生计生委 2015 年全国流动人口卫生计生动态监测调查的结果。调查方式及范围按随机原则在全国 31 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流动人口较为集中的流入地抽取样本点,开展抽样调查。调查对象选择在本地居住一个月及以上,非本区(县、市)户口的 15 周岁及以上流入人口。调查内容包含个人的家庭、经济及就业、公共卫生及计划生育情况等部分。调查方法采用分层、多阶段、与规模成比例的 PPS 方法进行抽样,调查结果具代表性。

3.2 变量测量

3.2.1 因变量

依据以往文献对劳动人口及失业人口的讨论(易成栋等,2015;周长洪,2003),本文将失业人口定义为男性 16-59 岁、女性 16-54 岁,有劳动能力但无业,且对就业有需求者。再参照本文的数据来源,选择“五一”节前一周是否做过一小时以上有收入工作的问题对是否无业进行划分,再以 4 月份是否找过工作作为是否有就业需求的测量,若两道题回答无业且有工作需求者才被界定为失业人口。此外,根据本文研究内容仅将跨省流动人口纳入研究范围中。

3.2.2 自变量

影响省际流动人口失业因素的选取,除了参考以往相关文献所使用的变量,包含个人特征,如性别、年龄、户口类型、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流动特征,如流动原因、流动时间、居住意愿以外,考虑我国区域间发展存在巨大差距,使得各地失业率存在差异的情况下(刘志,2006;李若建,1998),加入户口所在地及流入地作为欲考察因素,主要将其划分为东、中、西部三大地区来探讨省际流动人口失业受区域发展的可能影响。表 1 为所有自变量及因变量的样本分布情形。

3.3 分析方法

首先采用描述性分析,对省际流动人口在不同特征下所形成的失业分布作出基本描述。随后进行二元 logistic 回归分析,将不同特征的变量逐步纳入模型中,共建立四个模型来分析多类因素对省际流动人口失业的影响。模型(1)是省际流动人口失业受个人因素的影响,模型(2)是在模型(1)的基础上加入区域变量,模型(3)则是在模型(1)的基础上加入流动特征变量,最后模型(4)是将所有变量纳入,全面地分析各因素对省际流动人口失业的影响。以下是各影响因素与省际流动人口失业之间关系:

$$\text{Logit } p = \ln (p / (1-p)) = \sum b_i x_i$$

其中 p 为因变量,表示失业所占比例。 x_i 为自变量, b_i 为回归系数。

4 省际流动人口失业特征基本描述

2015 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显示,流动人口总计 193125 人。排除非跨省流动人口及非经济活动人口后,省际流动人口就业人数为 80099 人,其中失业人数为 2039 人,计算出省际流动人口的失业率约为 2.48%。表 2 是省际流动人口失业变量与各个影响因素进行交叉分析以及单因素分析的结果。

表 1 省际流动人口失业因素的变量与样本分布

变量名称	赋值说明	样本数	百分比	变量名称	赋值说明	样本数	百分比
是否失业	就业=0	80099	97.52	户口类型	农业户口=1	70353	85.65
	失业=1	2039	2.48		非农业户口=2	11786	14.35
性别	男=1	48203	58.68	户口所在 地区	东部地区=1	17146	20.87
	女=2	33936	41.32		中部地区=2	38552	46.94
年龄	20 岁以下=1	1402	1.71		西部地区=3	26440	32.19
	20 - 29 岁=2	23512	28.62	东部地区=1	52929	64.44	
	30 - 39 岁=3	27608	33.61	中部地区=2	9645	11.74	
	40 - 49 岁=4	22982	27.98	西部地区=3	19565	23.82	
	50 岁及以上=5	6635	8.08	流动原因	经济因素=1	77117	93.89
教育程度	小学及以下=1	12623	15.37		社会因素=2	5022	6.11
	初中=2	43666	53.16	居住意愿	离开=1	27191	33.10
	高中及中专=3	16392	19.96		尚未决定=2	11950	14.55
	大学及以上=4	9458	11.51		留下=3	42997	52.35
婚姻状况	未婚=1	15372	18.71	流动时间	短期(1 年以下)=1	10929	13.31
	已婚=2	66767	81.29		中期(1-5 年)=2	14570	17.74
					长期(5 年以上)=3	56640	69.96

性别方面，女性失业率高于男性。年龄方面，20 岁以下的省际流动人口面临失业的问题最为严重，随着年龄增长，失业率逐渐下降，直到 30-39 岁时失业率降至最低，但 40 岁开始失业率又略为上升，整体呈现先降后升的分布情形。不同教育程度也体现出失业率的差异，随着教育程度提升，失业率逐渐下降。婚姻状况中，已婚者失业率仅未婚者的一半左右。农民身份者的失业率则稍高于非农民身份者。

户口所在地的失业率为由东向西递增，相比于户口在东部者，中西部的失业率更高。流入地区方面，失业率也是呈现由东至西依次增加的情形。

经济因素流动者的失业率为 2.02%，与社会因素流动者相比，失业率减少 4 倍

表 2 省际流动人口失业的交叉分析与单因素分析结果

	变量测度	就业率(%)	失业率(%)	卡方检验	P 值
性别	男	97.81	2.19	39.85	0.000
	女	97.11	2.89		
年龄	20 岁以下	92.58	7.42	60.59	0.000
	20 - 29 岁	96.91	3.09		
	30 - 39 岁	98.25	1.75		
	40 - 49 岁	97.64	2.36		
	50 岁及以上	97.26	2.74		
教育程度	小学及以下	96.76	3.24	16.32	0.000
	初中	97.57	2.43		
	高中及中专	97.58	2.42		
婚姻状况	大学及以上	98.20	1.80	209.53	0.000
	未婚	95.88	4.12		
户口类型	已婚	97.89	2.11	4.61	0.032
	农业户口	97.47	2.53		
户口所在地区	非农业户口	97.80	2.20	115.62	0.000
	东部地区	98.58	1.42		
	中部地区	97.81	2.19		
流入地区	西部地区	96.40	3.60	122.04	0.000
	东部地区	98.11	1.89		
	中部地区	97.10	2.90		
流动原因	西部地区	96.12	3.88	1108.53	0.000
	经济因素	97.98	2.02		
居住意愿	社会因素	90.48	9.52	41.00	0.000
	离开	97.15	2.85		
	尚未决定	96.74	3.26		
流动时间	留下	97.97	2.03	21.97	0.000
	短期(1 年以下)	96.61	3.39		
	中期(1-5 年)	97.57	2.43		
	长期(5 年以上)	97.68	2.32		

以上。短期流动者,相比于中长期流动者,失业率更高。居住意愿中,选择留下的失业率(2.03%)低于选择离开及尚未决定者(2.85%、3.26%)。

5 省际流动人口失业因素的 logistic 回归分析

表3的分析结果显示,个人特征、区域特征及流动特征对省际流动人口失业皆呈现出显著性影响。模型(1)纳入了个人特征变量,除了户口类型以外,其余变量皆呈现显著性影响。就性别而言,女性失业机率比男性高,原因一方面可能和中国传统家庭分工中固有的性别角色有关,由于“男主外、女主内”的观念使得男性多数从事经济活动,作为家庭主要的收入来源,而女性主要的职责是操持家务,必须将大部分的时间花费在从事无报酬的劳动上,因此降低了女性在外就业的机会。另一方面则可能和社会上普遍对于女性的性别歧视有关,由于大多数的就业单位即使在男性与女性其个体客观条件相当的情况之下,对于女性依然存在着主观性的偏见,最终导致了女性在就业上的弱势地位及其困难(罗俊峰等,2015;戴霞,2005)。

年龄对失业存在负向影响,但其作用程度又呈现倒U字型变化,说明了年纪较轻者可能因工作经验不足而造成失业的情形,但在阅历随着年龄而增加后,失业率也会随之降低,因此年龄增长将有利于就业的稳定(张丽琼等,2017;綦松玲等,2014);然而,当达到一定的年龄后,作用程度开始呈现下降的趋势,这是由于省际流动人口的工作类型以体力型劳动为主,在体能随着年龄的增加而出现降低时(陈国斌等,2011;周长洪,2003),可能增强其高龄失业的风险。

教育程度与失业之间呈现负向变动,表示教育程度较高,失业的可能性较低;反之,教育程度较低,则提高失业的可能性。该结果再次印证诸多研究中教育对于流动人口在抑制失业及促进就业上存在的正面效果(张丽琼等,2017;徐玮等,2016;綦松玲等,2014;胡鞍钢等,2010;戴霞,2005),更显示出当今劳动力结构性矛盾的问题,由于我国对于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渐增,但目前整体劳动力人口中,依然存在大量劳动力素质偏低的失业人口,而教育作为衡量个人就业能力的重要指标之一,教育程度的提升必然对于劳动力供需的结构性失衡带来一定程度的缓解作用。

已婚者失业机率比未婚者低,该结果与以往研究结果相符(杜鑫,2009),显示出婚姻使得已婚者对于所建立的家庭拥有更多抚养及照顾的责任下,将增强其就业动机,因而减缓其失业情形;反之,尽管未婚者仍可能和已婚者一样,存在一定程度上必须照顾家庭成员的职责,但在其尚未由于婚姻而组建新生家庭的情况下,目前只需要抚养原生家庭的成员,再加上未婚者的父母更有可能处于尚未退休、仍在就业的阶段,此时未婚者的抚养责任也就更轻,甚至未婚者本身可能仍处于需要父母进行经济支持的状态,这相较于已婚者可能多出抚养自身儿女、配偶及配偶之父母的责任下,其抚养压力相对小许多,因此在就业动机上也会相对薄弱,从而造成较高失业的情形。

模型(2)是在模型(1)的基础下,纳入了区域特征变量。其中,户口所在地区与流入地区皆呈现显著性影响。首先,从户口所在地区来看,中、西部的失业率高于东部,导致该结果的原因可以从区域间的发展差异来进行解释,由于中西部的总体经济社会发展较为缓慢,导致人口素质偏低的情况下,当该地区的人口流入经济发展相对发达的东部地区时,受到人口素质普遍低于本地人口的影响,在就业竞争上无法形成优势,因而容易面临失业(张明,2010)。目前由于西部地区仍处于低城镇化水平,并以农村的居住型态为主,使得该区的各项发展相对落后,进一步造成

劳动力素质的低下，当人口流出至其他城市或地区时，他们在流入地只能从事劳力型工作或长期处于无业的状态，因此区域发展的差异性对人口素质的高低产生影响，并进而导致流动人口工作能力的受限及在引发失业的问题上存在决定性的影响。

其次，在流入地区的比较中，流入中西部的省际流动人口，其失业可能性明显高于东部，并且再根据中部及西部两个比较组分别与东部进行比较所形成的回归系数来看，西部作为比较组时的作用程度高于中部，因此省际流动人口失业的可能性将会随着流入地区越朝向西部的方向而有所提升。不同流入地区导致失业可能性存在差异的原因也可能和区域经济发展程度有关（熊思敏等，2008），与前述户口所在地区不同的地方是，流入地区所表达的是该地区的劳动力需求，由于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相对滞后，所能提供的就业机会一般少于整体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东部，因而造成较高的失业率。东部地区作为经济增长以及技术进步迅速发展的首要区域，

新的就业机会不断增加，使得流动人口能够被流入地所容纳，即使在多数情况下，技术的进步可能会导致部分劳动力引发结构性失业，但这可被视为短期性的问题，若以长远的角度来看，技术进步实则能够创造更多生产部门并细化分工，增加更多的就业机会才能达到降低失业的可能，因

表 3 影响省际流动人口失业因素二元 Logistic 回归分析结果

变量(参照组)	比较组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性别(男)	女	0.246*** (0.046)	0.267*** (0.046)	0.065 (0.047)	0.094** (0.048)
年龄 (20岁以下)	20-29岁	-0.555*** (0.112)	-0.578*** (0.114)	-0.302** (0.116)	-0.320*** (0.116)
	30-39岁	-0.868*** (0.128)	-0.869*** (0.128)	-0.476*** (0.132)	-0.468*** (0.132)
	40-49岁	-0.639*** (0.130)	-0.682*** (0.130)	-0.235* (0.134)	-0.266** (0.134)
	50岁以上	-0.492** (0.145)	-0.556*** (0.146)	-0.122 (0.149)	-0.166 (0.150)
教育程度 (小学及以下)	初中	-0.372*** (0.063)	-0.296*** (0.063)	-0.335*** (0.063)	-0.258*** (0.064)
	高中/中专	-0.468*** (0.079)	-0.382*** (0.079)	-0.439*** (0.080)	-0.346*** (0.080)
	大学及以上	-0.788*** (0.107)	-0.627*** (0.107)	-0.775*** (0.109)	-0.606*** (0.109)
婚姻状况(未婚)	已婚	-0.631*** (0.066)	-0.603*** (0.066)	-0.477*** (0.068)	-0.452*** (0.068)
户口类型(农民)	非农民	0.093 (0.075)	0.100 (0.075)	0.084 (0.076)	0.100 (0.075)
户口所在地区 (东部)	中部		0.383*** (0.074)		0.393*** (0.074)
	西部		0.729*** (0.075)		0.738*** (0.075)
流入地区(东部)	中部		0.543*** (0.069)		0.442*** (0.070)
	西部		0.677*** (0.050)		0.569*** (0.051)
流动原因(经济因素)	社会因素			1.627*** (0.060)	1.540*** (0.061)
居留意愿(离开)	尚未决定			0.104 (0.064)	0.071 (0.064)
	留下			-0.309*** (0.052)	-0.309*** (0.052)
流动时间(短期)	中期			-0.274*** (0.077)	-0.292*** (0.077)
	长期			-0.315*** (0.064)	-0.322*** (0.064)
截距项		-2.303*** (0.121)	-3.114*** (0.141)	-2.523*** (0.132)	-3.283*** (0.151)
样本量		82138	82137	82138	82137
卡方检验值		370.96***	671.89***	1019.24***	1272.15***
自由度		10	14	15	19
-2LL		18728.043	18427.066	18079.770	17826.808
伪R ²		0.0194	0.0352	.0534	0.0666

注：括号内数值为标准误；*、**、***代表在 10%、5%、1%水平下显著。

此区域发展的进步对于就业拥有正面且积极的效应及关联性。

模型 (3) 是在模型 (1) 的基础下, 纳入了流动特征变量, 结果显示流动原因、流动时间与居住意愿皆呈现显著性影响。首先, 经济因素流动者的失业机率明显低于社会因素流动者, 其原因可能和经济因素流动者的就业动机更为强烈有关。由于经济因素流动者在本质上便是需要以就业作为手段来达成其经济目的, 因此就业动机较强烈, 失业率也较低, 再加上过去的研究将多数流动人口的流动原因归结为流出地的劳动力剩余以及追求更大的经济利益 (刘娟, 2007), 因此当流动人口以经济因素做为目的而进行流动时, 能否顺利就业必将备受重视, 所产生的失业率自然也较低。此外, 慕松玲等 (2014) 的研究结果也得出由于随迁、婚嫁等社会因素作为流动原因的流动人口, 其最初的流动目的本与经济因素无关, 就业动机较为薄弱的情况下, 使得就业的稳定性较低, 因此能够提供不同流动原因会导致失业可能性发生差异的观点上获得更多方面的论证。

居住意愿的程度也会影响失业发生的机会, 与拥有强烈居住本地意愿者相比, 留在本地倾向不明或选择离开的省际流动人口失业风险较高, 表示居住意愿越低, 将表现出越高的失业风险。由于居住意愿低的人群仅将流入地视为短暂停留地, 仍考虑回流家乡或再流动到别地, 因而较不重视在本次流入地是否能顺利就业以及本次流入不会对其带来长远的影响下, 可能造成其失业率的提高。诸如部分农民工前往城市就业属于季节性移动, 多于非农忙季节外出务工, 流动性较强而造成其就业存在强烈的不稳定性; 又或是目前的流动人口逐渐注重其就业权益, 对于工作岗位的福利及保障有一定的要求下, 出现了频繁流动的状态, 多次的流动可能仅作为最终就业的尝试及比较, 因而增加其失业的可能性; 再者, 居住意愿的低落可能会影响其社会融入及社会参与, 进而导致更高的失业风险, 这是因为社会资本对于就业亦存在一定程度的正面作用, 像是流动人口可透过社区活动来结识更多当地朋友, 藉以获得就业信息或是工作推介。另一方面, 考虑到本地工作单位一般不偏向雇用短期员工, 因为长期居住稳定性低的雇员存在较高经常离职的风险, 这将造成人事异动及训练新员工的成本增加, 因此当省际流动人口在居住本地意愿上表达出较为低落的意愿时, 则容易提升其失业的可能性。然而, 居住意愿与失业之间可能存在相互影响的关系, 表示失业虽然会受到居住意愿的影响, 但居住意愿也可能受到失业的影响而有所改变, 两者的因果关系较为复杂, 作为本文不足之处, 后续仍须为两者的相互作用做出进一步的理清及说明。

最后, 在流动时间的变量中发现, 长期流动者的失业机率较短期流动人口者低, 这可能是由于长期流动者在本地找工作的时间长, 自然更容易找到工作, 失业风险也随之降低; 相反地, 短期流动者因为刚来到流入地不久, 短期内仍在求职及适应环境而暂时无业的情况下, 才造成了较高的失业率, 该结果与以往研究获得了相互的验证 (张丽琼等, 2017; 郭琳等, 2011), 显示出随着流动时间的增长, 流动人口的人力资本、社会资源及适应能力逐步得到积累与加强, 这将有助其达到缓解失业并实现就业的情形。此外, 对于省际流动人口来说, 距离较长的流动使得流出地与流入地存在更多方面的差异, 因此流动时间的增长对其适应本次流入地的生活并降低失业可能有更加显著的效果。

模型 (4) 将本研究考察的所有变量一并纳入, 作了全模型分析。与前述模型相比之下, 所有变量的作用方向不变, 但部分变量的作用程度有所下降。首先, 从个人特征的方面来看, 性别变量的回归系数发生了明显的下降, 此部分的变化和模型 (3) 加入了流动特征变量后, 亦导致了性别变量的回归系数产生下降的情形大致吻合, 因此能够推测性别的影响力受到了流动因素的影响。

响，其中女性可能偏向社会因素型流动，男性则偏向经济因素型流动。年龄变量的回归系数也有幅度不小的下滑迹象，根据和前面各个模型的比较与观察中，可以发现当流动特征被纳入后，造成了年龄变量的回归系数降低，部分结果甚至不再有显著性的影响，这可能和年龄在 20 岁以下的省际流动人口，他们更多是和父母随迁或是来到流入地求学有关。另一方面，考虑到某部分 50 岁以上的省际流动人口也可能是同子女随迁的情况下，与 20 岁以下的年龄组同属社会因素型流动，从而使得两者之间虽然存在年龄上的差距，但结果却未呈现显著影响，因此年龄因素和流动原因可能存在一定程度上的相关。婚姻状况的解释力也受到了流动特征的影响，由于部分已婚人士会带着家庭成员随迁的情况下，将涉及子女就学以及长期看照父母的问题，因此相较于未婚者而言，他们更可能选择稳定地居住在流入地，使得婚姻状况的影响力部分被居留意愿所解释。教育程度方面，其回归系数的降低可能与区域特征变量有关，相较于东部地区，户口所在地为西部地区者，其普遍教育程度偏低，这也和我国区域发展的差异进而造成不同地区之间存在庞大人口素质差距的现实情形相符，因此教育程度的作用可能部分受到了户口所在地的影响。

6 结论与讨论

影响省际流动人口失业的主要因素可归纳为两大部分，一是由省际流动人口个人条件所引发的失业；二是受到外在环境影响所导致的失业。

首先，从省际流动人口本身的条件来看，教育程度偏低导致其就业选择受限，当部分工作对专业知识和技术有一定程度的要求时，省际流动人口存在与工作条件不匹配的问题。再者，依照国家正常的发展进程，劳力密集型产业很大比例会逐渐被知识密集型所取代，这将使得省际流动人口成为结构性失业的高度风险人群，而其中教育程度不足正是造成该群体就业时的最大阻碍。

然而，教育程度偏低的问题与外在环境因素所导致省际流动人口的失业又有着密切的关联，区域间社会经济发展程度的差异使得基础教育直至专业型人才培养的资源分配不均，中西部所获得的教育资源因区域发展失衡而严重不足，所能培育出的高知识及技术性人才受限，当中西部人口流入东部与本地人口相互竞争时，常因劳动力素质劣势而增加其失业的可能性。此外，中西部发展落后使得此地区本身无法提供足够的就业机会，不仅产生人口大量外流，也导致流入该地区的人口更容易面临失业，因此区域间的发展差异对省际流动人口失业存在重大影响。

针对省际流动人口因前述的两大因素所导致失业的问题，我们尝试做如下两个方面的政策讨论：一是短期可通过开设职业教育训练，提升所需的专业知识及技能来帮助现下失业者顺利就业，在长期则须对人力资本提升采取高度重视，藉由教育体制的改善，全面提高教育年限使人民获得更高阶的知识，才能有助于低阶劳动者向高技术工作转型，提高收入水平并降低工作被替代而失业的风险。二是通过政府及企业加大对中西部地区整体发展的投入及建设，促成中西部经济社会进步的进步，不仅能创造更多就业数量来有效减缓失业，也能促使教育资源获得提升，对人口素质产生正面的影响，增加就业竞争力来降低失业风险。

总体来说，失业不仅是个人所导致的结果，其中亦伴随着整体经济社会环境所带来的影响，因此失业问题是由微观性质的个人问题与宏观背景下的社会问题两者所交互形成的，解决方式不仅需要省际流动人口努力地充实个人能力，国家及社会也有义务来协助其改变现况，才能达到有

效降低失业并获得持续发展的双赢局面。

[参 考 文 献]

-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 2017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R]. 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 2018.
- [2] 段成荣,袁艳,郭静. 我国流动人口的最新状况[J]. 西北人口,2013(6).
- [3] 马红旗,陈仲常. 我国省际流动人口的特征——基于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J]. 人口研究,2012(6).
- [4] 余运江,高向东. 中国人口省际流动与省内流动的差异性[J]. 人口与经济,2018(1).
- [5] 刘耀. 流动人口对深圳社会经济发展的思考[J]. 南方人口,1996(2).
- [6] 张侠,田杰. 我国沿海地区产业结构演变趋势初探[J]. 科技与管理,2006(4).
- [7] 成学贞,王超. 我国结构性失业的现状、原因及对策[J]. 经济纵横,2005(5).
- [8] 黄婵. 产业结构升级背景下流动人口就业结构调整研究——以上海市为例[J]. 特区经济,2012(3).
- [9] 沈琴琴,张艳华. 北京市产业结构调整下的流动人口就业结构研究[J]. 中共济南市委党校学报,2010(4).
- [10] 李群,杨东涛,陈郁炜. 产业转型升级背景下的新生代农民工失业和离职——基于就业能力的分析框架[J]. 华东经济管理,2014(12).
- [11] 钟在明,李朝敏,蒙维洋. 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能力与产业发展需求的差距及对策[J]. 农村经济与科技,2011(8).
- [12] 成必成. 劳动力市场结构性失业的成因及解决策略[J]. 企业经济,2013(5).
- [13] 罗俊峰,童玉芬. 流动人口就业者工资性别差异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2012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的经验分析[J]. 经济经纬,2015,(1).
- [14] 王俊秋. 山东省女性流动人口就业状况研究——以济南、青岛、德州女性流动人口为例[J]. 山东教育学院学报,2009(5).
- [15] 张丽琼,朱宇,林李月. 家庭化流动对流动人口就业率和就业稳定性的影响及其性别差异——基于2013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的分析[J]. 南方人口, 2017(2).
- [16] 张航空,杜静宜. 家庭流动对流动人口家庭成员就业状况的影响[J]. 人口与经济,2012(5).
- [17] 刘璐璐. 郑州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就业问题浅析[J]. 改革与开放,2011(20).
- [18] 文久富,陶斯文,刘琳. 城市化进程中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就业现状、存在问题及其对策分析[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7(8).
- [19] 慕松玲,鲍红红,刘欣,赵龙宇. 吉林省流动人口就业和居住情况研究[J]. 人口学刊,2014(5).
- [20] 王胜今,许世存. 吉林省流动人口的就业特征及其影响因素分析[J]. 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3(3).
- [21] 易成栋,张纯. 北京失业人口的空间分布及其影响因素[J]. 中国人口科学,2015(6).
- [22] 周长洪. 南京市失业人口状况分析[J]. 人口与社会,2003(3).
- [23] 刘志. 以陕西为例的区域失业问题研究[J]. 科技信息,2006(10).
- [24] 李若建. 我国的城镇贫困、失业、通货膨胀与区域发展[J]. 社会学研究,1998(4).
- [25] 戴霞. 流动人口工资收入影响因素中的性别差异——以厦门市流动妇女为例[J]. 南方人口, 2005(3).
- [26] 陈国斌,刘丹. 江苏省流动人口失业问题研究[J]. 人口与计划生育, 2011(5).
- [27] 徐玮,杨云彦. 流动人口失业特征、分布及影响因素分析[J]. 人口与发展,2016(4).
- [28] 胡鞍钢,盛欣. 高等教育对中国青年城镇就业机会影响的实证分析[J]. 高等教育研究, 2010(12).
- [29] 杜鑫. 北京市城镇劳动力失业的经验分析[J]. 中国市场,2009(40).
- [30] 张明. 西部农村劳动力素质与劳动力转移的关系研究[J]. 对外经贸,2010(10).

- [31] 熊思敏,朱轶. 东部地区技术进步与就业增长的经验[J]. 当代经济,2008(12).
- [32] 刘娟. 中国省际间人力资本流动原因的隐变量分析[J]. 人口与经济,2007(2).
- [33] 郭琳,刘永合. 流动劳动力的人力资本与就业身份选择——基于东部和中西部地区在京就业者的比较[J]. 人口与社会,2011,(1).
- [34] 张国英. 劳动就业转型与中国失业率时空变迁[J]. 南方人口, 2012(1).
- [35] 聂爱霞. 失业保险对失业持续时间的影响—以厦门为例[J]. 南方人口, 2012(3).

**The Main Factors Affecting the Inter-provincial Floating Population's Unemployment in China :
An Analysis of the Data of the Dynamic Monitoring Survey of Migrants by National Health and
Family Planning Commission in 2015**

CHEN Yi-Chen, LU Jie-Hua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Abstract: Floating population has always been an important issue for China's academic researchers. The scale of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continues to grow over time especially the proportion of inter-provincial floating population rising year by year. Economic factors are the main reasons for the inter-provincial floating population's migration and their unemployment is an increasing significant social issue in China. Based on the data of the Dynamic Monitoring of Migrants by National Health and Family Planning Commission in 2015, the researcher analyzes the three factors effective on the unemployment of the inter-provincial floating population, i.e. their characteristics of individual, regional and migration and the effective mechanism by descriptive analysis and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 The result shows that structural unemployment constitutes the majority of unemployment of the inter-provincial floating population and the causes of the structural unemployment closely correlate to the individuals' ability and the regional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Some suggestions are put forward to for the unemployment of inter-provincial floating population accordingly.

Key words: Inter-provincial floating population, Unemployment, Logit model